

论莫兰的复杂性思想之“道”

高宣扬



莫兰摄于 2011 年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及精密思考，年近九旬的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埃德加·莫兰于今年初发表他的新著《道》¹。这本书，对于这位耄耋智者而言，几乎可以被称为提早写出的一篇“遗嘱”（le testament）²，是以近百年的观察、分析和亲身体悟为基础，描述和总结他的独特方法的贯彻过程及其思路，并使之更紧密地结合当代全球政治和法国实际政治的状况，以便揭示笼罩社会的灾难性危机的性质及其可能的出路。全书浸透作者对人类的爱，对历史的深邃反思对生命的创造精神的肯定，浓缩地呈现出莫兰终生思索关切的焦点，即把我们自身的生命同大自然和社会的整体命运连接在一起。

莫兰的复杂性思想，首先是产生于、并实施于当代社会的一种政治哲学，它的出发点和首要目标，就是关注人的生命及其历史遭遇，试图引导生活于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的现代人，一再地审慎反思自身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代生活环境的恶化和危机，彻底走出现代性的精神桎梏，以人性的自然本质享受生活自由之美，创建一个适应于复杂性环境、并发挥具有复杂性思想的现代人的新社会；其次，复杂性思想，作为一种对迄今为止的西方现代性经验进行总结和批判的“方法”，它不仅是进行历史总结的有效方法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憧憬，而且还试图指明实现文明政治的具体策略，因此，莫兰的新著《道》的副标题就是“走向人类的未来”（*Pour l'avenir de l'humanité*）。在莫兰的成百篇专著、论文和对话录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对“人类未来”的关切。其实，当莫兰谈到“未

¹ Morin, E. *La Voie*. Paris. Fayard. 2011.

² Lemire, L. *Livres-Hebdo*, Paris. N° 848, 14 janvier 2011.

来”的时候，就已经凸显出他的思路的哲学特征，这就是乐观主义的建构主义的原则，既把视线集中朝向现实的实际生活，也把历史和未来纳入思考的网络中，同时也同步地将内外世界联系起来，表现出对人类生命的创造精神的坚毅期望和信任。莫兰指出：“我用 300 页左右撰写出来的新书并不是悲观主义的。...我置身于那些严格区分可能的与不可能的观点的人们之中。”乐观主义不是凭空产生，不是单凭想象而设定的“乌托邦”，而是基于对过去和未来的双重透彻分析，基于对人类和历史本身的创造精神的信赖和期望。

对莫兰来说，关切历史和未来以及分析当代局势是密不可分的，而在分析及预期的过程中，人类生命本身的内在精神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不仅必须始终相互关联，而且还必须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使内外世界的创造性生命活动，连接成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及不断更新的统一生命体，使内外世界真正成为共命运和具有协调的创造精神的生命体³。

莫兰深信人类原本是与自然、与历史互为关注和相互依存的；现代性的发展和膨胀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造成当前社会和文化的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人类反省自身的思想偏差以及走出历史误途，才能唤起人类与自然的内在创造力量。

在谈到他的方法的哲学性质时，莫兰明确地说，他的思想是一种“结合性的构建主义”（co-constructivisme），“换句话说，我所说的，是将外在世界与我们的内在精神结合在一起，以便创建新的现实（c'est-à-dire que je parle de la collaboration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notre esprit pour construire la réalité）⁴”。莫兰指出，方法本身就是源自对人的性质以及世界本质的理解，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思想方法论，而且也是分析现实复杂社会的策略原则，又是导向新的未来的道途设计能力。

从哲学上讲，莫兰所感兴趣的，是彻底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统一思想模式的影响，通过把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灵活结合和相互转化的途径，寻求揭示世界奥秘、并同时又能彻底解放全人类的自由创造精神的广阔可能性。莫兰认为，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特别是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所倡导的、旨在建构“主体性”的种种意识哲学以及宣称可以获取“客观真理”的科学思维模式，都在树立主体的优先地位的基础上，一方面人为地分裂本来密不可分的主客体，另一方面又赋予理性和逻辑化的主体以宰制客体的特权，力图论证主体有能力通过逻辑的分析和推理以及归纳的主观智慧，首先把自身建构成与客

³ Morin, E. *La voie. Pour l'avenir de l'humanité*. Paris. Fayard. 2011: 21.

⁴ Propos recueillis par Laurent LEMIRE, *Interview de Edgar Morin, Philosophe et sociologue. Il faut vivre autrement !*

体相对立的“逻辑主体”，在此基础上，通过“严谨的”科学手段，实现理性化的主体对客体的控制性操作，使之成为有利于主体的秩序井然的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现代技术以其“人为的制作”，创造了由异于第一自然的“第二自然”、并以“第二自然”为主体而统治“第一自然”的“现代生活世界”的模式。因此，在他看来，现代性的特征就在于：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所控制的世界的基础，又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这样一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人造的结构，变成越来越具有人为建造性质的世界，成为一种可以被人密码化和神秘化的世界。**在这种世界中生活的人，一方面为自己的创造而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打乱了原来的传统社会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和道德的秩序，寻求改变个人与社会的新关系；另一方面，又寻求一切可能的创造途径，达到自我超越，以回应其永不满足的无限的理想的自由需求⁵。

莫兰认为，这一切使西方现代化以来短短五百年间，急速地破坏成亿年累计沉淀而成的自然界珍贵财富，并捣毁了人类本身的生活环境，把世界引向灾难的深渊。

把人的内在创造精神与外在世界对立起来，又以自私的人的主体性为中心，不顾一切地开发自然界，不只是把人自身与外在世界割裂开来，而且简直就是无异于自我孤立和自我封闭，并最后导致人的自我毁灭。

因此，莫兰认为，从本质上说，所谓二元对立是人为的；也就是说，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及其对立，并非世界的存在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为实现现代性目标设定出来的思想方法的产物。所以，莫兰一再声称：最关键的是彻底颠覆二元对立模式，使人的创造力，通过主客双方的相互对流交汇而形成一股强而有力的创造动力；而在内外交汇的过程中，始终都要鼓励内外双方各自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并不断使双方的创造力量进行旨在更新自身创造精神的交流、互动和自我再生产⁶。

人们一般满足于笼统地把莫兰的理论归结为“复杂性思想”，但这种急于概括“复杂性思想”的种种论述本身，已经违背了“复杂性”的宗旨。“复杂性”是无法概括归纳的；进行各种形式的概括，就是传统二元对立模式的有意无意的实践策略，其目的是在思维和实践过程中，把本来密不可分的主客双方区分开来，然后又按照人为地树立起来的主体的利益和意愿，将客体纳入从属地位。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曾经指出：“‘简单’根

⁵ Heidegger, M.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50: 70;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73: 30

⁶ Morin, E. *La voie. Pour l'avenir de l'humanité*. Paris. Fayard. 2011: 30-34.

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简单化’”⁷。复杂性思想的基本精神，正是反对各种以概念、公式或命名的方式来简单地表达思想和世界本身的复杂性的企图。任何概括和归纳，如果是在主体优先地决定“方法”、“原则”和“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那就难免成为主体对其概括对象的“整理过程”，成为主体对外在对象的操作，而外在对象就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扭曲的被动地位。同时，二元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在树立主体对客体的优先地位的过程中，实际上扼杀了主体和客体本身的自我创造能力和潜力，使两者陷入双重地被遏制的地位，也使它们双双丧失活生生的生命力。

莫兰在批判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时候，始终不遗余力地集中批判传统逻辑的各种原则和方法。传统逻辑的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只适用于有限范围内对具体问题的思索，但从根本上背离了世界和思想的极端复杂的现实本身。所以在批判传统逻辑以及以此为基础而流传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时候，莫兰非常重视由原籍罗马尼亚的法国哲学家斯蒂凡·鲁巴斯格(Stéphane Lupasco, 1900-1988)所提出的“矛盾的动力学逻辑”(la Logique dynamique du Contradictoire)或“能动的逻辑”(la logique de l'énergie)的研究成果。莫兰之所以重视这种新型的逻辑，是因为它把逻辑本身从原来被传统思维模式当成主体宰制客体的手段，改造成为既肯定内外世界的自身创造力量，又强调它们双方在创造过程中实现双向交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也就是说，矛盾的“动力学逻辑”或“能动的逻辑”已经不是外在于世界和思想本身的抽象逻辑，而是内在于世界和思想本身的创造性原则，它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世界和思想的复杂性的创造性动力本质。

莫兰援引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指出，本来，真正的逻辑，并非单纯是知识推理的手段，而是世界上一切事物（不论是外在世界，还是内在世界）的自我创造的“路径”。同样地，鲁巴斯格特别强调万物中的生命存在，因为恰恰是生命体具有属于其自身的生存逻辑和创造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新型逻辑，也可以被称为“活的生命体的逻辑”(la logique du vivant)。因此，在鲁巴斯格和莫兰看来，“我们所谓逻辑，就是既包含肯定、又包含否定，既含有同一性、又包含非同一性或多样性；它强调生产（或生成），不管是通过它们的共存，还是通过它们的共同连结或通过它们的分离以及通过它们的独立存在。总之，这种逻辑同时地倡导一种矛盾概念或非矛盾概念，无非在于肯定导向自身的动力而已”⁸。

建构主义是继结构主义之后而产生的思潮，它一方面吸收结构主义的“反

⁷ Bachelard, G. *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 Paris. PUF. 1934: 13.

⁸ Lupasco, S. *Préface du livre Le principe d'antagonisme et la logique de l'énergie. Prolégomènes à une science de la contradiction*. Paris/Monaco. Hermann/Le Rocher. 1987[1951]: 55-56.

主体性”思想，强调思想创造的周在自然环境以及由自然形成的文化的基本结构的稳定性，反对孤立地夸大主体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加入了新的动力因素，把原本不变动的结构，改造成为具有内在创造力量的“建构性动力生命体”。

莫兰的“结合性的建构主义”的宗旨是充分发挥内外世界本身的生命体的自我创造精神及其周围环境的相互和谐交流，同时强调内外世界的生命体的自我创造活动的极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是由于内外各自独立或相结合的生命体本身的高度自由、极端活跃性及其自律性，这实际上也是一切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最高表现，不容许有任何外来的干预；另一方面，还由于内外世界的生命体所处的环境及其交错性结构的复杂网络的不可归纳性和不可预测性，即它的迥然不同的个体性、充满极端偶然性、变动性及潜在可能性。

在这里，尤其要强调复杂性思想中所重视的生命“个体性”(individualité)，因为它是导致复杂性的生命基础。“个体性”这个概念有它自身的系谱学，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它形成不同的认识。个体性概念的系谱学所显示的，恰恰就是近代哲学一再地依据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歪曲“个人”和“个体”的复杂关系的历史。

重要的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西方学术视野中，个体性已经不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核心。正如莫兰在最近的对话中所说，它所主张的生命个体性，不是“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一方面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又视规则法律为神圣不可侵犯；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心态(la mentalité capitaliste)。莫兰所重新界定的个体性，是返回自身，折向自身(le repli sur soi)，并蔑视所有由当道的统治者“精英们”所制定的规则⁹。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从个人的人本中心出发，把“个体”与“个人”混淆起来，把个人生命的个体性理解成个人中心主义，特别强调其中的“个人利益的优先性”。因此，在中国学术界往往把 Individualism 翻译成“个人主义”，并把它当成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以便揭示 16 世纪以来流行于西方近代社会中的个人至上观念，揭示其个人自由及个人财产的优先性。但是，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深入，新一代思想家所强调的“Individualité”，主要是为了突出“个体存在的唯一性”，即其不可取代性和不可归纳性；同时也为了强调它的神圣的自律性，即强调它自身的绝对独立自主性，由它自身决定它的命运及其走向。由此，莫兰所主张的个体性，恰恰发扬了生命自身的绝对独立精神以

⁹ Morin, E. *Une voie pour éviter le désastre annoncé*. Paris. <Rue 89>. 23/01/2011.

及个体生命的复杂性。

任何生命都是一个个具有绝对尊严的自在自为的复杂系统，它不容许任何否定或削弱其自律性的可能倾向，为的是显示各个生命体自身的唯一特征，宣示其异于他者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同时又表现其任意改变自身状态的可能性。所谓复杂性，正是由于各个不可归纳的个体生命的多元存在及其随时可能改变的生存方向，同时也是由于环绕个体存在的个体性生命的周在世界的高度变动性和无限可能性。

重视个体生命的唯一性，使莫兰重新估价德国杰出思想家马克斯·斯蒂纳(Max Stirner)的个体性概念。马克斯·斯蒂纳曾经遭受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双重批判，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生命的个体性，甚至把它称为“唯一者”(Der Einzige)。马克斯·斯蒂纳指出：“人”的概念是太抽象了，以致无法表达每个人的“个体性”，因为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因而也都是“超越于人”(plus qu'homme)。斯蒂纳所说的“唯一的自我”，并非一种思想，因为它是无法纳入思想的，它是无法表达、无法描述和无法指明的，因为它是只属于个体生命本身。唯一者是享有自身主权的个体生命自身，它永远绝不向它之外让渡它的任何一丝一毫的主权，也不可能异化成为任何他者或任何观念。因此，唯一者，就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世界整体当成它的财产¹⁰。

莫兰在捍卫这种“个体性”的至高无上性的时候，驳斥那些由此引申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论调，强调突出个体性，除了显示个体生命存在的不可归纳性以外，除了显示以个体性为基础的世界的复杂性之外，没有别的任何贬低或否认他者存在的意图，更没有虚无主义的意义。

和莫兰一样，当代法国思想家德勒兹也在他的《意义的逻辑》一书中肯定马克斯·斯蒂纳的个体性概念。德勒兹认为，个体性恰恰表现了世界存在的原本模式，也是世界之所以复杂到无法概括的程度的主要原因¹¹。

当然，强调复杂性就可能导向对同一性和稳定性的否定，因而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为此，莫兰指出：虚无主义不相信一切，否定世界的存在基础；但他所强调的，是世界具有它自身可以自我解决和自我更新的知识基础及能源动力。为此，莫兰还引用由智利生物化学家和生命科学家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经确凿原始资料验证的当代生命科学成果，强调自身生命的唯一性在最先进的生物化学物理的实证检验中，是立足于生命自身的极度复杂性的事实上¹²。

¹⁰ Stirner, M.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1844). Stuttgart. Reclam. 1972: 20-23..

¹¹ Deleuze, G. *Logique du sens*. Paris. Minuit. 1969:130.

¹² Morin, E. *Le complexe, qui est tissé ensemble*. In *La Complexité, vertiges et promesses*. Paris. Le Pommier/Poche. 2006: 25.

由此可见，莫兰的复杂性思想的哲学基础，既立足于对传统思维模式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之上，又崇尚个体生命的不可取代性及其运作机制的不可归纳性；既揭示宏观世界的错综复杂性，又着力于分析其深度层面的千丝万缕细腻结构的微观差异性；既指明世界原本的极度复杂性，又反对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坚信个体生命及其周围世界的自我创造精神；既强调基于个体生命的唯一性的世界复杂性，又反对相对主义和盲目发展观，主张使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每个人能够自由地与其所处的外在世界共命运同创造。

二 莫兰复杂性思想的当代性

“当代性”概念所反映的，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和社会潮流的实际状况，体现出特定思想创造及其结果的现实性，既显示它对于历史经验的重视，又表现它对未来倾向的把握精确度。所以，当代性一方面集中表现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又凝缩社会生命体自身的发展能量及其可能倾向，是社会生命体及其内部的每一个体的生命创造力的充分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莫兰的建构主义正是集中了历史的、社会的和个体的三重当代性。

本来，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建构主义只在心理学、艺术和逻辑学科中传播，后来它被德国的埃尔朗根学派¹³所发展，并在法国进一步采取多样形态传播和发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当代生命科学的发展，随着生命结构及其内在基因的高度复杂性的揭示，建构主义更在 20 世纪中叶之后蓬勃发展起来，于是，多种多样的建构主义就成为一股思潮充斥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而且，由于建构主义对创造精神及其复杂性的推崇，它很自然地同多种多样“视世界为复杂系统和复杂网络”的思想流派结合在一起。

20 世纪以来，深知现代性的危机以及反思传统二元对立模式的危害的许多思想家，已经先后采取各种方式，表述他们的多样化的“复杂性思想”，以致可以说，建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精神的重要标志，而建构主义也在这个意义上说刻上“当代性”的标志。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类似于莫兰而反复强调世界及思想的复杂性的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诉诸于建构主义的思想模式。在德国，除埃尔朗根学派以外，还有鲁曼(Niklas Luhmann)、曼菲尔特·弗朗克(Manfred Frank)、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 Sloterdijk)、沃尔弗拉姆·霍格勒波(Wolfram Högerebe)及贡

¹³ 作者注：埃尔朗根学派(Erlangen Schule; Erlangen School)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立的。这一学派的建构主义第一代理论家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保尔·洛朗琛(Paul Lorenzen, 1915-1994)、库诺·劳伦兹(Kuno Lorenz, 1932-1994)、曼弗列德·李德尔(Manfred Riedel, 1936-)、伊尔丁(Karl-Heinz Ilting, 1925-1984)、弗里特里希·卡姆巴尔德(Friedrich Kambartel, 1935-)、卡姆拉(Wilhelm Kamlah, 1905-1976)、施威默尔(Oswald Schwemmer, 1941-)、彼得·雅尼斯(Peter Yanich, 1942-)、克里斯蒂安·梯尔(Christian Thiel, 1937-)及居尔根·密特斯特拉斯(Jürgen Mittelstrass, 1936-)等人。

德尔·阿贝尔(Günter Abel)等,而在法国更是不计其数,几乎可以说,凡是倡导克服传统思想模式的新一代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复杂性思想”,只是他们各自以独特的自身方式加以表述,由此也导致当代法国思想的高度复杂性和极端活跃性;同时,凡是倡导复杂性思想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以不同名目树立起“建构主义”的旗帜。

就在莫兰创建他的复杂性思想的时候,鲁曼已经同时地通过对“社会系统”的探索,在突破其老师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论”的思路时,提出了以复杂性思想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系统论”(Soziale Systeme Theorie),从根本上颠覆了帕森斯的古典系统论模式。按照鲁曼的复杂性思想,系统是在其运作中首先决定于其本身的运行功能;所以,“不是结构决定功能;而是相反,是系统的功能决定系统”¹⁴。这里的核心,就是莫兰所强调的各个独立系统内力量的自我创造性及其对内外世界造成的极端复杂性的效果。

但是,鲁曼和莫兰一样意识到:当代社会及其个体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性的发展的影响。各个独立系统的内在创造力是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由社会自身的分化过程的复杂化所催化产生的。正如莫兰和鲁曼所一再指出的,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功能上的急速分化;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以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基轴而发生区分化和演化的话,那么,当代社会是靠其功能方面的不断加速自我分化而演进的。问题正是在于:当代社会以其本身各个系统的功能发展及运作的结果,导致了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身,即导致当代社会从最初刚刚由中世纪发展而来的近代大型静态社会结构,迅速地分化成多重化和多样化的各种动态社会系统。原有的大型社会的存在,已经随着近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加速进行而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导致近代社会的各个系统分化过程的极度复杂化;这种系统的复杂化,一方面使各个系统之间渐行渐远,相互脱离关系,变成为各个具体的系统同它们的特殊的环境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每个独立的社会系统又演变成为新的功能分化的起点,导致社会系统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层次化,以致使各个系统原有的自律性,变得越来越高,甚至使它们达到各自只靠本身的自我参照(Selbstreferenz)来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莫兰和鲁曼等人的复杂性思想是他们对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化的分化机制及其极端复杂性的观察结果,也是他们对现代性的深度反思的理论产物。

自我参照和自我生产(Autopoiesis)概念是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也是莫兰的复杂性思想的灵魂。由此他们不再使用传统西方社会科学的“实

¹⁴ Luhmann, 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Aufsätze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Bd. I. 1970: 45-56.

体” (Substance) 概念，而是代之以含有极端活跃的变动性的“时间的视域” (horizon temporel) 和“功能的动态分析及其相互比较的方法”，以便灵活处理各种社会系统的“过度复杂性” (Supercomplexité; Überkomplexität)，并使社会系统的运作及其运作中之自我参照和自我生产性质清楚地展现出来。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概念就是为了使时间的视域贯彻到系统的功能分析之中。环绕着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概念，他们才有可能在其复杂性思想中，突出“双重偶然性” (Doppelte Kontingenz; Double Contingencies) 和“极端复杂性”或“过度复杂性”的性质及其在实际运作中的多重可能性，同时也显示其内在动力的自我生产的无限潜在能力。

鲁曼曾说：“一个系统的最重要标志是它同世界的复杂性的一种关系 (Wichtigstes Merkmal eines System ist ein Verhaeltnis zur Komplexität der Welt)。所谓**复杂性**，就是把它理解成可能性的总体性 (Unter Komplexität ist die Gesamtheit der Moeglichkeiten zu verstehen)；这种可能性的总体性是实际的历程；不管它是在世界之中 (世界复杂性)，还是在一个系统之中 (系统复杂性) 呈现出来的。每一个系统的建构总是只包含世界的一个部份，只能让各种可能性中的一个有限数量得到实现。系统是在同一种复杂性相区分的意义上，建构起其内和外的区别，即建构起其自身的秩序。系统的环境始终是**过度复杂、无法加以概括和无法加以控制的**”¹⁵。自我参照也就是世界的复杂性表现的相关网络 (Selbstreferenz ist Korrelat des Komplexitätsdrucks der Welt)”¹⁶。

复杂性不但意味着自身结构及其运作的极度复杂性，而且，它尤其显示它的潜在的“可能性的总体”。在复杂性思想的景观中，一切都是可能的！复杂性与可能性是同一件事情；复杂性是指结构及其运作的状态，可能性是指它的动态潜力及其难以预测的变动性和转化能力，又同时地指它的内在自我生产和自我更新的复杂背景和前景。不把复杂性与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复杂性思想崇尚生命的自我创造力量的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各系统之外的各个系统，往往成为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而且，分化层次越多，各社会系统越要从其本身的角度重新观察其它社会系统，导致各系统相互观察层次的重迭化，造成观察“多阶化” (multiplication des ordres dans l' observation) 和观察视野多元化和交叉化。各个系统功能的发

¹⁵ Luhmann, N.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9[1963]: 41.

¹⁶ Luhmann, 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4: 600-602.

展，往往越来越立足于各系统功能本身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过程。

帕森斯的系统功能论原本立足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局部 / 全体”二元模式的基础上¹⁷，以自然界为模式，将社会系统理解为具有同样维度结构的**开放的同一性系统**。鲁曼看到了各种系统的相互独立性以及社会系统远比自然系统的“极端复杂性”及其自我反思性(Autoreflexion)，一方面凸显各个系统的高度独立性，强调各个系统诸内在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及其同周在环境诸因素之间的紧密关连性，使各系统独立的本质特性，不但仰赖于系统本身诸内在因素的复杂自律性，而且也仰赖于内在因素同环境诸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凸显社会系统内维持自身发展的“自我参照”或“自我指涉性”以及立基以其上的“自我分化性”(Selbstdifferenzierung)，同时也强调社会系统重复一般系统特性的本质，从而使社会系统不再从个人间相互关系的观点进行观察，而是走上了超越传统人文主义观点的新型社会系统观的研究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莫兰和鲁曼的社会系统论是一种超人文主义和“反人本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sm)的新型系统论。这样一来，他们的复杂性思想的主要特征，便是完成了从“局部 / 全体”的模式到“自我差异化”和“自我生产”的转折。

在方法论方面，莫兰和鲁曼反对将传统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僵硬地搬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所通用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以及相应的逻辑归纳、演绎和推理，其有效性是很有限的。

经验主义固然可以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相当可靠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瞭解世界的实际状况，但是，经验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透彻说明世界的本来面目。况且，经验研究方法充其量也只能有助于分析局部的表面问题，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世界的各个系统的主要运作原则。更何况在当代社会充满着人为科学技术干预的条件下，任何数据都可能具有自我生产和自我增值的能力。面对这些自我生产和自我增值的资料，经验主义是无能为力的。经验主义者看不到数据本身的局限性，更看不到现代社会中的资料所具有的自我生产能力，使他们无法跳出狭隘经验的范围，或者满足于感性经验所提供的有限数据，或者津津乐道于人为创造的试验室和实验室所验证过的数据。同时，他们往往将数据理解为绝对固定的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性，殊不知这些规定性本身原本就是他们自己所共认的“标准”的具体化产物。其实，在莫兰和鲁曼看来，资料远不是那些以数字表达出来的统计产物，而是有自我生产能力的生命体；数据本身也是一

¹⁷ Aristotle, *Metaphysics*. Oxford. 1963: 45-50.

种具有自身生命的系统单位。现代社会中的数据是隶属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次系统，它们由于相互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形成了它们内在的体系网络，致使它们产生独具特色的自我参照性，并在同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中，为了保持本身的生命再生产，能够在其自身范围内进行一种特有的沟通，实现它们内部的语义参照系统。在当代社会充满着符号、密码、象征的互动情况下，现代数据可以以其自身的自律而不断扩充和增值，实现其同其它社会系统的简单化程序。研究当代社会的社会学家如果看不到现代数据的上述复杂性质，将使自己迷失于数据迷宫之中而不能自拔。莫兰和鲁曼认为，只有以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观点分析当代社会的数据，并将数据的处理及其分析纳入社会系统的大范围内加以思考，才能正确理解现代性的许多关键性问题。

莫兰和鲁曼在深入研究社会结构系统的过程中，看到了它的运作的复杂性及其自我生产性；系统之所以运作，不是因为它首先是系统，而是因为它内在的基本功能的相互自我参照所决定的。系统如果脱离系统中的功能自我运作，它就是抽象的、空洞的和无生命的系统。但是，反过来，社会系统中诸基本功能的自我运作，也不是在它自身自我封闭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在同其环境的复杂关系中，通过系统内诸功能之间的相互协调和自我参照，以某种“尽可能简单化”的程序，将系统同其环境的上述复杂关系对系统内诸功能自我运作的影响和干扰尽可能地减少，以达到使本系统诸功能的自我运作实现自我生产的目的。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在批判旧的传统认识论的同时，试图以更多元的模式与方式开创认识论的未来发展道路；特别是尝试以新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取代传统受意识哲学深刻影响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这种建构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新的原则，既然正处于摸索的阶段，难免产生多种多样的方案。鲁曼所尝试贯彻的建构主义认识论(konstruktiv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的基本原则，是当时多元化的认识论新模式的一种；它主张将人的认识过程和外在世界看作是各自封闭的两大系统¹⁸；同时，还强调认识过程的对象并不一定同认识的主体及其思想过程有直接的关联。

实际上，莫兰和鲁曼的**建构主义认识论**不但是同马图尔纳和瓦列拉等人的认知生物学(Biologie der Kognition)¹⁹并行发生，而且也受到数学结构“莫比乌斯环带”(Möbius Band)、史宾瑟·布劳恩(Spencer-Brown, G.)的“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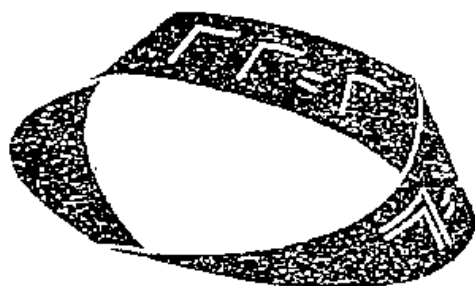
¹⁸ Luhmann, 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7;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Bd. V: *Konstruktivistische Perspektiven*. Opladen. 1990.

¹⁹ Maturana, H. R. *Erkennen: Die Organisation und Verkörperung von Wirklichkeit*. Braunschweig / Wiesbaden. 1982; Maturana, H. R. / Varela, F.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Boston: New Science Library. 1987.

同一性” (a triple identity)²⁰以及拉康关于“现实/象征性/想象性”三重相互交错运作的“巴洛美纽结” (Noeud barroméen)²¹的深刻启发。



拉康的巴洛美纽结图



莫比乌斯环带结构

莫兰的建构主义的主旨，就在于发挥并连接内外结构诸因素的自我创造力量，使内外因素不但连接在一起，而且相互启发、促进和转化，使两者不再像二元对立模式所分离的那样，而是连接成内外及其中介的三位一体相互渗透的动力网络。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本身不是静态被动的结果，而是具备自我建构的创造力的独特生命体。

²⁰ Spencer-Brown, G. *Laws of Form*. Ashland, Ohio: Book Masters. 1994[1969]: 5.

²¹ Lacan, J. *Séminaire XXII : R.S.I.* in *Séminaires de Jacques Laca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8.

如前所述，莫兰等人所提出的复杂性思想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基本方法论，并没有脱离 20 世纪下半叶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方法论论战背景。这一时期内，传统理性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和主体中心主义等思考模式，都遭遇到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批判。鲁曼所提出的上述建构主义认识论，只不过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多元化建构主义认识论中的一种罢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生命科学在探讨人的认识、心理、意识和思想活动的规律方面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这是生命科学同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进行综合研究的结果，也是多学科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流程的缩影。

莫兰和鲁曼同后现代主义者相类似，在其理论思考中，将重点从“统一”和“同一”转向“差异”、“自我差异化”和“自我生产”。世界、自然、社会和文化，本来就充满着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具有其自身生命的自我差异化本身。差异和自我差异化才是世界和社会的基本状况。鲁曼在 1985 年接受访问时，强调**所有对于世界的观察是以差异为基础的**。系统理论所从事的各种观察之所以能够进行，系统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连之所以能够保持，就是因为世界本身充满了差异，世界和自然以及社会是多种多样的差异性所组成的。传统本体论将世界、自然和社会当成以某种“实体”为基础的统一体，不但强调观察世界的主体必须立足于主体同一性的基础上，而且还以寻求世界与主体的同一性作为基本目的。鲁曼与此相反，认为世界在实际上是多种系统相互交错的结果，世界并不是以某个单一的“终极实体”作为其基质，而是由多质和多中心的大小不同的独立系统所构成的。有多少个系统，就有多少世界；反之亦然。至于多质多种世界的运作原则，也是非同一的：各个世界系统各自以其独特的自律而运作。

在法国倡导建构主义的思想家当中，最接近莫兰的复杂性思想的，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列维-施特劳斯和索绪尔的结构人类学和结构语言学，推动布尔迪厄从新的理论视野，重新观察现象学，并改造当时的语言哲学，使他走上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革新道路。布尔迪厄逐步地发现了上述结构主义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固定性和不变性，因而存在着某种对于行动者心态和创造主动性的忽视倾向。布尔迪厄在他的长期田野调查和研究中，意识到行动者心态和行为结构的双重特征，即心态和行动结构，都在其社会历史脉络中，共时地(synchroniquement)进行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双重运动。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共时运作，表明行动者心态及其行为，都同时具有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双重特点。他把心态和行为以及世界运作的这种双重结构，称为“共时的结构化和被结构化”。这就是结构的主动结构化和被动的被结构化的“

共时性”。这样一来，布尔迪厄也就超越了传统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建构的结构主义” (le structuralisme constructiviste) 或“结构的建构主义” (le constructivisme structuraliste)²²。为了突显他的特殊的结构主义对于创造性的重视，有时，他也把他的独具特色的结构主义，称为“生成的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e génétique)²³。

布尔迪厄指出，他的理论的宗旨是颠覆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并加以对立的传统二元对立模式，揭示相互转化的内外世界的共时双向运作过程。也就是说思想、行为和世界，既共时地向内外双向转化，又以同样方式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传统时间概念中的单向单线结构，变成为多向多维度的转变可能性²⁴。这就是复杂性思想的生动而深刻的表达方式，但同时它又隐含难以表达的面向，显示复杂性本身只能在可能性和潜在性的维度中存在和运作。

这一切表明：莫兰的复杂性思想并非偶然，它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也并不是唯一的。我们只有把莫兰的复杂性思想与同时代的各种形式的复杂性思想加以比较和分析，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哲学基础。

由此可见，批判二元对立模式的方法是多样的，同时也是可不断更新的。这一方面说明：一旦走出二元对立模式，当代思想就有可能开拓无限的新视野，找出各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摆脱二元对立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多样性本身恰恰表现了复杂性世界结构同复杂性思想过程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从而也由此引导出对于人类未来乐观前景的憧憬。

三 莫兰复杂性思想的特征

莫兰的复杂性思想虽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当代性，但莫兰本人毕竟是一位独具创造特色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的多重身份及其复杂生活经历，使他的复杂性思想具有异于同时代其他理论的不可取代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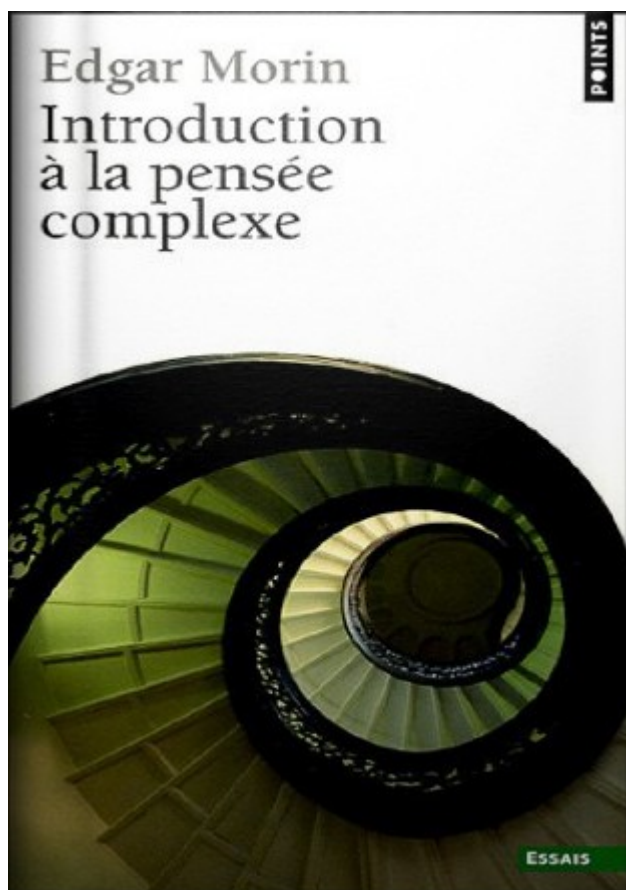
莫兰本身曾经在他的《复杂性思想导引》²⁵一书中，简略又深刻地阐明其复杂性思想的特征。

²² Bourdieu, P. *Choses dit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87: 147

²³ Bourdieu, P. *Choses dit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94: 24.

²⁴ Bourdieu, P. *Raison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Paris: Seuil. 1994: 22.

²⁵ Morin, E.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à la pensée complexe*. Paris. Points. 2004.



莫兰著《复杂性思想导引》原版

莫兰比较明确地阐述他的复杂性思想，是在1982年出版的《带有良心的科学》²⁶这本书中。当时，莫兰经历了从50年代开始围绕“方法”的长期思索，把焦点集中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悖论上。他说：“寻求方法的目的，不是找到适用于一切知识的单一原则，而是指出一种复杂性思想的迫切必要性；这种复杂性思想不是简单地归结到科学中，也不朝向单一的哲学，而是促使它们通过实行对话性的环扣(en opérant des boucles dialogiques)，进行它们之间的相互沟通”²⁷。

莫兰进一步指出，复杂性思想需要把各种领域的知识和视野都吸纳进去，通过开放性的思索，贯彻多学科分析的途径，实行交互穿梭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式思维，把多维度、多方向和多种可能性进行综合性考虑。莫兰说：“复杂性”的词源是 *complexus*，由 *com* 和 *plexus* 两部分组成，前者意思是“共在地交织在一起”，后者则指“错综复杂地交错起来”。

关键在于恰当地估价现代科学的意义。莫兰说：“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

²⁶ Morin, E. *Science avec conscience*. Paris. Fayard, 1982.

²⁷ Morin, E. *Science avec conscience*. Paris. Fayard, 1982: 55

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奴役性和致命性的潜在可能性大大多于有益的可能性。早从广岛事件开始，原子弹意味着现代科学不但具有无限的潜力，而且它含有极大的危险，它不只是威胁我们的生命体，而且特别是危害社会和政治。当代的生化基因科技不只是导致我们的生命的工业化，而且也引起工业的生化革命。我们猜想：对人的大脑的生化处理必将直接地干预我们的精神活动以及控制我们的智力”²⁸。更重要的是，莫兰进一步揭示了当代政治势力对科学研究的干预及加强了其对科学的控制，加剧了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巨大危险性。

莫兰在书中的分析始终包含了多维度多重交错的思路，表达了他的复杂性思想的核心精神：一方面鼓励和发扬有良心的科学家和一切具有公民责任感意识的人们，针对时代的新特征，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在清算启蒙以来传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毒害的同时，也自觉地运用复杂性思维方法，使自己首先成为自身生命及其生活的环境的主人，另一方面强调对世界和生命的未来给予实际的和有效的关切，在自身实践可及的范围内，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及智慧，监督和影响自己和社会及文化的发展。

莫兰在揭示其复杂性思想的关键因素的时候，同时也没有忘记提醒公民们对传统教育的警惕。莫兰认为，提倡复杂性思想必须同时进行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因为自启蒙以来，西方国家推行了旨在对抗复杂性思想的理性主义就经验主义的教育。莫兰说：“当我强调复杂性思想的拉丁原词 *complexus* 并由此突出其‘交织构成的网络总体’ (*tissé ensemble*) 的时候，主要是指出问题的关键，正是在于表达复杂性世界的各个相互差异、而又相互交错的成分，指出它们好像地毯中相互交错构成的交织品系统那样，但不幸的是，我们已经被传统教育灌输了‘各领域和各学科相互分离’的顽固观念。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要重新学会把分离的复杂因素从组起来。所谓‘相互连接起来’，并不只是把他们的每一端连接起来，而且是建构起相互交错的环扣，同时，又要意识到：仅仅建构相互交错的环扣是不够的，还要重新返回到环扣本身，即充分理解到：交错而成的环扣本身是自我生产的 (*autoproduit*)。其实，生命从一开始就是自成环扣而且还是极端复杂的环扣。它是一种源自自然的机器；而它的特征就是：一方面永远返回自身，另一方面又永远不停地生产出越来越多样化的极其不同的元素，以便创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极端复杂的活生生的生命。世界本身就是极其神秘地由它自身而自我生产出来的。现代知识必须具备足够的手段和基本概念，以便准确地与世界相连接，并同时地把世界重新地连接起来”²⁹”。

莫兰所论述的复杂性思想，实际上并非简单的单一成分，也不是一成不

²⁸ Morin, E. *Science avec conscience*. Paris. Fayard, 1982: 31-33.

²⁹ Morin, E. *La stratégie de reliance pour l'intelligence de la complexité*.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ystémique*. Paris. Vol 9, N° 2, 1995.

变的规则系统；相反，它是由许多因素构成，而其中，尤其包含三大方面的思想方式，即批判性思想 (*la pensée critique*)、创建性思想 (*la pensée créative*)、负责任的思想 (*pensée responsable*)。三种思想方式交错在一起，相互穿插和相互促进更新，与它们面对的世界也同时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交错，形成思想和世界的活跃的创造过程。

批判性思想的原则，具体说来，就是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具体环境和客观背景，对事物进行细致的分析，重视各个环节中的具体分析程序，务必针对具体细节上的差异，实行深入细腻的考察。莫兰指出：事物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在类型上和看得见的层面上的不同，更重要的还是它们的每一个层次和各个关节点上的差异，这就是它们的结构内部所隐含的纵深层面中的细小差别；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最深层的小差异，都可以导致严重的重大分歧。绝不能小看在细致方面的差异，它们往往是引发大规模区分化的根本性根源。

传统逻辑和二元对立模式往往试图以简单的公式或公式化的方式，提出各种试图有助于解决一揽子问题的统一方案。但事实是：世界的复杂性总是在表面的统一下掩盖着千差万别的不同，特别运用表面的同一掩饰细腻的差异。传统教育所教导的，恰恰是自称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各种场合的“普遍性原则”。

世界的极度差异化，还在于以静态的雷同形态掩盖时时待发的变动性，以一般化的同一麻痹观察者的眼睛，以便掩饰时刻可能发生的潜在变动。所以，批判性思想倡导动态和潜在变动的观点，把重点放在可能发生的未来景观，并用内外结合的全面观察方法，特别注意发生事件的环境、外在条件以及发生事件的前后脉络。

创建性思想很重视矛盾性 (*contradictaires*)、启发性 (*heuristique*) 以及自我超越性 (*auto-transcendante*) 的原则。正如前面所一再揭示的，传统思维模式和逻辑规则，把重点放在“同一”和“无矛盾性”，为此也提倡“排中律”，试图把复杂性世界统摄在简单化的主体思维中，幻想由此找出所谓的规律性知识。但复杂性思想相反，承认思想和世界本身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揭示思想和世界本身的创造生命力及其难以归类的可变性、潜在性和可能性，同时也考虑到发生各种可能性的具体环境的复杂性³⁰。

负责任的思想原则主张对一切相关力量实行真诚的、开放的和多方面的对话，旨在鼓励走出禁锢着思想创造的原有环境及统治秩序³¹。

³⁰ Lipman, M. *Good Thinking*. In *Inquiry*. XV (2), 1995: 37-41.

³¹ Lipman, M. *The role of distributed thinking in preparing teachers to teach for reasoning*. Communication présentée au colloque 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of Inquiry (NAACI). Oaxaca: Mexique, April 1996.

所有这些复杂性思想的原则，不但在贯彻中包含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面临各种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而且，也因长期称霸的传统教育制度的压抑和干扰，因此，最可行的办法，就是鼓励教育改革，反复提出和推广复杂性思想的原则及其推行策略，也同时进行不断自我批评和自我修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孜孜不倦地进行教育，以便逐步使之扩大影响³²。

为了逐步贯彻复杂性思想的原则，莫兰主张对现有思想进行改造，提出复杂性思想的“范例” (paradigme)，建构有助于认识复杂性思想的“复杂性知识论” (épistémologie complexe)。莫兰具体地阐述了“复杂性知识论”的基本原则，它包括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自我组织论 (la théorie de l' auto-organisation) 等。

复杂性思想的贯彻策略，显然包含了不断吸收它所批判的当代科学技术成果，并使之改造成为复杂性思想的内在成分和自我更新的力量。例如，莫兰之所以重视信息论，是因为它承认世界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承认世界本来既存在“有序”和“失序”，又存在“重复信息”和“噪音”，而信息之所以必要，正是由于它承认：信息乃是从这种复杂矛盾的现象中沉淀剂过滤出来的新因素。所以，信息也在这个意义上说成为了新的具有控制能力的组织性力量。

莫兰还总结生命科学和最新环境科学的成果，最近还补充一个新的原则，即“自动生态保护的自我组织” (auto-éco-organisation) 原则，既倡导自律性，又促进对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他说：“生命体总是自律的，因为它既要消耗它所处的环境的能量，同时又要从它所消耗的能量中吸取必要的信息和重组其自身组织结构”。

莫兰意识到：面对复杂性世界的生命复杂组织，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只考虑到自身的生存而无视其生存条件的自我生产能力及其自我更新的可能性。生命体必须总结现代性的经验，在个体生命的延续及其再生产的过程中，要注意到生命所需能量的循环性再生产和生命体及其周围世界的内在能量的相互补偿，并为造就一种能够保证生命能量的不断生成和更新的新世界的可持续性提供条件，主动地选择自身的自我环保的生态及其循环再生产。

为此，莫兰接受并发展前述由斯蒂凡·鲁巴斯格所提出的“矛盾的动力学逻辑”或“能动的逻辑”，从复杂性思想出发，主张在思维中承认“既是

³² Lipman, M. *Thinking in education*.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这样、也是那样”的种种悖论，只是把“排中律”当成一种例外，反对把“非此即彼”当成绝对的逻辑规则，允许在它之外，更多地容许相互矛盾以及“亦此亦彼”的状况，特别容许存在及生命本身的多样变动可能性，并甚至把生命的不可预测性及其双重偶然性当成正常的基本现象。

而且，在莫兰所实行的“矛盾的动力学逻辑”或“能动的逻辑”看来必须充分考虑到（一）宏观的物质能量(*la matière-énergie macrophysique*)、（二）生命体的物质能量(*la matière-énergie vivante*)及（三）生命体心理能量(*la matière-énergie psychique*)三者之间的“三重能量的三极交错循环生成”的可能性。莫兰所支持和倡导的“矛盾的动力学逻辑”或“能动的逻辑”并非为辨别真假而设定，而是为了应用于能量的消耗及再生产，处理个体生命和世界生命的复杂关联及其与能量更新的复杂关系，同时也针对复杂变动中的同质化(*homogénéisations*)和异质化(*hétérogénéisations*)的相互关联问题。

莫兰指出：上述“含中律”是一种非常必要的“逾越逻辑”(*une transgression logique nécessaire*)，它同复杂性思想所提倡的对话原则是互补的。“排中律”和“含中律”均各自包含其自身的对立面和多样性，例如，“我既是我，又不是我”；或者，当我们说“我正在说话”，一方面意味着“作为意识主体的我正在说话”；另一方面又同时意味着“在我的头脑和身体中，有一种机器正在运作；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力量在‘我’之中运行和发生作用”。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存在着一种能够说话的“文化”，它类似于一种机器，一种在说话中制造原由的特殊机器，或者，还存在着一种通过这个特殊的机器而说话的“我们”³³。此外，在说话的“我”之中，很可能包含“匿名”或“某种最原始的本我”在说话。由此可见，普通逻辑所宣称的“同一律”实际上是复杂的，它的同一性中同时包含了异质性和多样性。所以，我们使用“含中律”，就是意味着我们承认：我们既是自身，又是他者³⁴。

莫兰将其思索的焦点，集中在现代知识及其思维逻辑的问题上，因为他认为当代一切危机的最终根源，就是自封“真理”、并号称有能力保障人类对自然的中心控制地位的理性知识。莫兰说：“导致错误和虚幻的理想的知识及思维的模式，至今尚未被认识、分析和批判”；“正是真理救世论(*Vérité-Messie*)

³³ 作者注：在这里，莫兰巧妙地用 *une machine causante* 这个短语，运用法语中的 *causer* 的双关语，既表示“说话”，又意指“造成原因”和“引起原因”，来表示这个说话的机器又是一个制造原由的“事端制造者”。因此表示说话的我们，包含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因素和事件，也潜伏着各种可能性。

³⁴ Lupasco, S. *La pensée complexe : Antidote pour les pensées uniques* [archive], *Entretien avec Edgar Morin*. 2004: 258.

所占据的中心地位，造成人类最疯狂和最恐怖的行动”。所以，在莫兰的整体思想中，批判、揭露和颠覆现代知识的“真理-救世论”的荒谬性及其罪行，乃是最核心的问题。

莫兰认为，对于知识的分析和批判，首先不能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单纯批判或否弃各种具体的知识，而是从根本上揭露其思想根源和思维模式。莫兰认为现代知识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们始终打着“理性”、“人性”、“以善制恶”、“科学”和“真理”的旗号，一方面把世间和历史的一切错误、恶、非正义丑的东西，都推诿于它们的“敌方” (ennemie)，另一方面对它们自身，却使用正当化、合法化、制度化和逻辑化的手段，将其自身的一切理念、方案、计划、欲望目的、策略和方法，论证为“正确”、“正义”和“唯一可行”的选择。为此，莫兰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揭露作为一切危机之源的“善恶二元对立论”，而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是以古代摩尼教的“善恶二元对立论” (la pensée manichéenne) 作为典范，长期以来，将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所奠定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加以正当化、合法化、正统化和推广化，并由此出发，主张使一切思想创造活动、社会文化活动和政治行为，都实现标准化和“精确化”，引导人们首先按照统治者所认定的“合法标准”，将每个人自身教育成为认识的和道德的“主体”，在分门别类地和按学科地对一切客观对象进行经验的和理性的认识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政治上合法的主体。

面对这种具有强烈欺骗性和蛊惑性的认识逻辑和思维模式，莫兰反传统之道，主张首先将世界看成模糊的复杂混沌过程，倡导一种穿插而游动、并不断变化的研究和分析方法。

因此，莫兰对知识的批判，一方面集中揭露和批判现代知识的虚假性及其逻辑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又采取多学科穿插、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并把知识问题同政治、社会、自然科学、现代技术、人的精神生活以及思想方法联系起来。所以，在莫兰对知识的批判中，很自然地包含着对现代政治、社会制度、道德文学、艺术、管理及教育的全面批判。

这就是说，在莫兰看来，对现代知识的批判，必须伴随着对社会制度、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的批判，必须揭示其思想和认识根源，揭示其思想模式和思维方法的虚假性，必须揭示**知识与教育、知识与社会制度以及知识与政治**的内在寄生关系；同时，也必须特别揭露现代知识与全球政治、全球信息网络制度以全球经济秩序的互动共生关系。在批判的过程中，既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又要从现实结构及其运作逻辑，并从未来的各种可能倾向，进行揭露和分析，贯彻莫兰本人所主张和倡导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多维多向穿插的思想方

法。

由此可见，作为一贯关切人类命运的思想家，莫兰所提出的理论和所贯彻的方法，从来都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家，但他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真理的追求者。他的思路和思考主题始终都游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浩瀚大海，来往于科学与哲学、文学与艺术、知识与宗教、实际与象征、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想象乌托邦之间的广阔时空，尝试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美学、历史学及文学中，吸取各种智慧和切实可行的方法，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他不愧为当代最活跃的“智者”。

与此同时，莫兰又不拘泥于理论的空泛探讨，而是紧密结合实际问题，特别是时局的现实问题，深入思考各国人民实际生活所面临的难题，关注世界政治、经济、技术、教育及道德的状况及其动向，表明他是进行实际改革和从事社会实践的设计师、探险家和活动家。

为了提供有效的改革方案，莫兰多年来致力于探索进行复杂性思维的方法。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历经三十年的岁月，莫兰投入到持久的和连续不断的方法论探索中，一方面揭露现代科学方法的错误及其虚假性和欺骗性，另一方面又创建新的复杂性方法，完成了长达六大卷的《方法论》巨著。

在《论方法》第一卷中，莫兰以“自然的本质”(*La nature de la nature*)为标题，首先批判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分离开来的单纯技术主义和科技专制主义方法，反对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加以绝对化，强调人文科学和人类学应该同自然科学相结合，并在探讨人的本性和人的文化的过程中，首先重视整个世界的混杂性和模糊性。他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不确定的混沌系统(*un système incertain du chaos*)，严厉批评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系统理论和控制论，创建了一种立足于世界的混乱关系基础上的“自我组织”概念。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知识都必须扎根于人本的和社会的认识的基础上。所以，混沌的方法论和复杂性思维，在本质上是人性的政治。

他在《论方法》第二卷中，他以“生命的生命”(*La vie de la vie*)为标题深入探讨了由于当代自然科学中**生命科学的**革命而引起的各种有关生命的复杂问题。他特别重视当代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人类学问题。对于人的生命的研究，在他看来，必须采用**一般化的环境保护主义**(*écologie généralisée*)。“一般化的环保主义”是上述“复杂性的方法”在生命研究中的运用，这是一种复杂的“环境保护相互关联系统”，它高度综合了生命成长过程中生命同其周在世界之间的整合、选择、适应、自我组织、相互参照和互动的关系。莫兰指出：任何

政治和教育活动，不能忽视人性和世界的复杂性。人性和世界的复杂性是相互连接和相互渗透，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赋有多重的生命和生活在生命的多种生命体之中：他自身的生命、他人的生命、他处的社会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以及生命（chacun vit une vie pluralité de vies, sa vie propre, la vie des siens, la vie de sa société, la vie de l'humanité, la vie de la vie）。同时，每个人都是为了在其生命中维护过去为了生活在现在，又为了使未来具有生命而活着。健康的政治必须以此种生命政治为基础，推行一种旨在延续和穿越多重生命的政策。

莫兰在《论方法》的第三卷中，论述了“认识的认识过程”，强调认识并非单纯的逻辑程序，更不是主客二元对立统一的分析结果，而是集体性和社会性的认识组织过程，并把这一过程看作是“认识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 de la connaissance）的研究对象。莫兰的认识人类学的探索，加强了其方法论的人性基础，同时也批判和揭露了传统人性论的虚假性。莫兰认为，在认识中，人类进行了观念的组织活动（l'organisation des idées），对观念的生命（vie des idées）进行一种新型的“心智学”（noologie），深入分析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的创造性特质。他独创地使用了古希腊 nous 的概念，发掘人类心智中的极其复杂的创造活动的混乱不定的轨迹，探讨与人类语言应用、思想创造和意志感情密切相关的复杂性逻辑。

在《论方法》第四卷中，莫兰集中地研究了人的思想观念、习俗、生活作风、道德意识以及人类组织同人的思想方法的密切关联，使他所倡导的复杂性思维方法，更紧密地同对于人类文化、经济、教育和政治的总批判联系在一起。莫兰极端重视对人类精神观念的分析，因此，他认为《方法》第四卷也可以当成第一卷，因为这一卷实际上就是对知识的认识的导论，是复杂性思想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方法》的第五卷题名为“人性的人性”（L'humanité de l'humanité），即“人的身份”（L'Identité humaine），集中研究人本身的身份这个很古老的问题。但是，莫兰采取了复杂性思想的最新方法，对身份作出新的解释，并使之成为抽象理论之外的具体生活方式问题，成为可以由当代公民个人自由地处理的审美生存方式。

《方法》第六卷的标题是“伦理学”（L'Éthique），莫兰首先区分他的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强调传统伦理学只是强迫性地要求顺从于建立在“善/恶”、“正义/非正义”的二元对立框架基础上的道德原则，而复杂性思想的伦理原则则认为善可以包含一种恶，同样地，恶也可以包含一种善；正义亦然，它可以

包含非正义，就好象非正义可以包含正义那样³⁵。

莫兰结合当代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地位，把他的伦理学原则及其贯彻紧密地同知识问题联系在一起。“一切否认个体性的知识，一切否认在观察中介入的观察者的创造精神的主体性意识，都只能在思考万物、特别是在思考伦理问题的时候显示出它的残缺性。为了统治物质对象，为了控制能源，为了操纵活着的生命体，它可能是有效的，但它对理解人类现实将是近视的，而且它对人类的未来将是威胁性的”³⁶。

总之，莫兰的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三重身份，使他的复杂性思想也具有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综合性质，而且，由于他一贯主张多学科开放式研究，也使他的复杂性思想既有综合性，又有具体性；既有网络性，又有纵深性，以致使他的复杂性思想能够在阐述和应用两方面都注意到“复杂性”本身的特征，表现出它的难以简单概括的特征，同时又包含潜在待发的生命性质。因此，人们双关语地根据法语原文 *encyclopédique* 的双重含义（既是循环的，又是百科全书式）称莫兰为“循环式却不简单重复的百科全书”思想家；也就是说，莫兰六大卷巨著《方法》，并非按传统顺序撰写，也不要求读者按前后秩序阅读，其中的重要概念都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

四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复杂性思想

对莫兰来说，关切人的核心，就是关切人的生命本身，而政治应该成为关切人类生命的终极学问。他指出：他上个世纪 40 年代开始的思路，一直把焦点集中在“方法”上，即寻求一种有效的方法，不只是找到思想上进行分析和推理的方法，而且还要寻求多种能够灵活地适应于各种复杂的时代和变动的历史环境的可行的“途径”，使创造性思想不致于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而是表现为灵活机智的“实践智慧”，有力地转化为实际的革命力量，也就是找到能够巧妙地把思想的人的内在创造精神同其所生活的外在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的途径，使人的生命内部所隐含、并随时可以迸发出来的积极性，不仅成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且成为内外世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把内外一切积极的创造力量都连成为多股的、多向的和富有潜力的生命力。莫兰说：“‘方法’这个词，

³⁵ Morin, E. *La Méthode. Vol. VI. Ethique*. Paris. Seuil. 2004: 60.

³⁶ Morin, E. *Éthique (La méthode 6)*. Paris. Seuil, 2004: 65.

在希腊语意味着‘道途’。我是执着于这个关系到人的命运的通道的观念。‘道途’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导向一种人性的政治，导向一种人类的政治的道路” (Le mot méthode signifie ‘cheminement’ en grec. Je suis assez attaché à cette idée du cheminement de l’humanité. La Voie est pour moi comme une introduction à une politique de l’homme, une politique de l’humanité)³⁷。

确实，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把治理城邦当成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把政治和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人生之路和思想方法都刻录着治理城邦的实践智慧的性质。

政治是众人之事，绝不是为少数政治家或政客们所垄断的“从上到下单向统治的方式”，而是要求贯彻复杂性思想的原则，使社会各方，不管是集体或个人，不管是公民或国家公务员，都齐心合力地和多向穿插地进行复杂性治理。所以，莫兰说：“我在《道》中发展了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要求国家、公众团体、私人协会和公民采取联合行动”(J’y développe une politique nouvelle qui nécessiterait l’action conjointe de l’État, des collectivités publiques, des associations privées et des citoyens)³⁸。

如果要谈到人的问题，就必须实际地讨论人的命运；政治是一切社会科学中最触及人的命运的学科。莫兰指出：“政治处理一切最复杂和最珍贵的事务，即个人、集体以及人类的生命、命运和自由”³⁹。所以，“政治向一切知识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它关系到一切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⁴⁰。

同样的，在他之前，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指出：近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生命。现代权力所关注的首要对象，就是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权力就是不折不扣的**生命权力**。

如果说政治关系到生命本身，那么，更确切地说，政治实际上关系到人的自由问题，因为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一切政治都是关于人的自由的规定、限制及其扩充和实施。如果政治不回答和不理睬自由问题，那么，它就丧失了政治的真正意义，它也就导致对人类政治活动的本意的背叛。反过来，任何政治只有环绕着自由的限制和扩充，它才能获得社会的确认，并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它的效益。

但对于莫兰来说，人的自由离不开全球的生存和生态环保。莫兰指出，人的自由生活必须在地球中实现。为此，莫兰把树立和加强人类共同体对地球的命运

³⁷ Morin, E./Lemire, L. *Entretiens*. In Paris. *Rue 89*. 2011, 01, 23.

³⁸ Morin, E. Interview de Edgar Morin, Philosophe et sociologue« Il faut vivre autrement ! ». In *Livres-Hebdo* N° 848, 14 janvier 2011.

³⁹ Morin, E. *Pour entrer dans le XXI siècle*. Paris. 2004: 11.

⁴⁰ *Ibid.* : 10.

的道德意识放在首要地位⁴¹。当前的任何政治都必须重视地球环保问题，莫兰称之为“地球意识”。接着，在2007年，在他的新著《生态环保的年代：地球决定于依赖地球的人》，莫兰再次呼吁把地球的命运列为政治和人的自由的核心⁴²。

这是一种新的文明的政治(une nouvelle 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以便引导陷于危机和生态破坏的人们走出由他们自身造成的困境。莫兰指出，他的“新的文明政治”的概念，是受到列奥波德·舍达尔·森格尔(Leopold Sedar Senghor)的启发，旨在将人列入政治的核心，把人同时地当成目的和手段，使之生活得很快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般地生存⁴³。更确切地说，莫兰所主张推行的一种新的文明政治，主要是要遏制在现代社会中恶性膨胀的个人中心主义，主张重新提倡相互间的团结和相互关怀，提倡共同关注社会共同体的命运，提倡推广教育，批判启蒙以来肆虐的现代性文化。

当法国现任总统萨尔科齐在2008年新年祝词中引用莫兰的“文明的政治”概念时，莫兰委婉地指出：“我并不排除萨尔科齐总统有可能在他的政治中实行这种文明的政治，但迄今为止总统并没有就此作出明确的解释”⁴⁴。接着，莫兰明确地指出：“我在两个重要问题上与萨尔科齐不一致。在外交政策上，我发现萨尔科齐与布什站在一起，而在内政问题上，他贯彻了对移民的非人道的政策”⁴⁵。

莫兰面临新世纪人类文化重建的紧迫任务，从关切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入手，提出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讨论人性不应是抽象的和不着边际的而是要从最实际有效的教育问题出发。为此，莫兰在他的《为了进入21世纪》一书中，一方面把西方的人性问题放在人文和教育危机的背景下，集中批判教育领域的腐败及衰落及其对下一代的危害，另一方面又依据时代的变化，提出拯救人性颓废的切实的教育改革方案⁴⁶。

莫兰始终把教育和对于现代知识的批判同政治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他不仅在教育论著中，而且也在其论述政治的著作中，强调知识批判、教育批判与政治批判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并以莫兰本人的复杂性思维模式，揭示知识思维模式、教育与政治模式之间的内在依赖渗透关系。

莫兰认为，教育本身就是政治的重要任务，又是保证政治本身避免腐败、进

⁴¹ Morin, E. / Kern, A.-B., *Terre-Patrie*. Paris. Seuil. 1996.

⁴² Morin, E. / Hulot, N. *L'An de l'ère écologique : la Terre dépend de l'homme qui dépend de la Terre*. Paris. Seuil. 2007.

⁴³ Morin, E. *Entretien avec Edgar Morin : pour une 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 Sur le site du ministèr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997.

⁴⁴ Morin, E. In *L'Article du Monde du 2 janvier 2008*

⁴⁵ Morin, E. In *L'Article de Libération du 9 janvier 2008*.

⁴⁶ Morin, E. *Pour entrer dans le XXI siècle*. Paris. 2004: 56-58.

行“自我更新”的重要场域。莫兰指出，一切教育活动基本上政治性的。教育历来就是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的场域，是政治角逐的关键领域。一切政治家和政治团体，都势必千方百计占据和控制教育场域，作为实行和保障其权力分配、权力再分配以及权力正当化的中心地带。莫兰一方面揭露现有政治系统、制度及其程序的教育基础，另一方面又在教育改革中寄托他的未来的环保的廉洁政治的希望。

真正的廉洁的环保政治，就是承认和主动进行复杂思维和复杂行动的变动系统。“正是政治本身最需要复杂性(c' est la politique qui a le plus grand besoin de complexité)”，因为在莫兰看来，政治关系到人和社会的一切，而人和社会又是最复杂的生命体。但是，现有的不合理的政治，虽然号称维护正义原则和自称具有合法性，却都违背和破坏复杂性思想和行动原则，试图把它所统治的社会和世界引向可被宰制的简单系统。当代政治制度特别利用现代教育网络，利用它在教育领域中控制、制造和宣传意识形态的有力地位，试图进一步巩固其统治秩序。

一切政治之所以难以避免陷入腐败的绝境，就是因为它们都热衷于自我封闭的制度化、体系化和系统化。莫兰说：一切体系，包括观念体系，都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而具有自我衰竭、自我腐败、自我瓦解的倾向(Tout système, y compris d' idées, tend, avec le temps, à se dégrader, se corrompre, se désintégrer)。对付这种不可避免的倾向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一种不断产生能量和制造热能的“熵”(entropie)，即通过与外界和他者的多向交流和交换过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自我组织、自我再生产。正确的教育活动，就是要符合这样的一种“熵原则”，这是一种无止境的和无约束的创造性的交换过程，并由此实现自我替代、自我更换和自我组织。政治必须靠健康的和良好的教育活动，来不断更新和重组，进行思想和体制的双重更新。但是，能够实现这种靠教育进行自我更新的政治，必定首先是一种人性的政治(une politique de l' homme)。

现代政治向现代知识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莫兰指出：现代政治的要害，就在于它本身存在和活动于一个一般化的世界和社会；而且，在这种一般化的社会中，一般的知识和专业的知识，都由于其长期一般化和专业化的恶性循环而陷于畸形、残废和瘫痪状态。立足于这样的知识基础上的政治统治，不能不是腐败的和垂死的。因此，改革政治的关键，就是改造教育和改造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

由此可见，莫兰的政治改革的思路，立足于这样的复杂性思考的基础上：

政治关系到一切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领域，但现有的知识却是欺骗性的和被分割围困和被摧残的。实行健康的政治，有待于培养尽可能多的、把握有关复杂性世界的知识和思维方法的新一代。

考虑到现代社会危机和教育制度的失败，莫兰还强调进行新型的道德教育。他认为，作为传统西方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个人主义已经失败。个人主义使现代人陷入恐慌、孤独、自我残害、危害社会共同体，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必须代之以互动的相互关爱和自我关照的双重道德原则。

由于紧紧把握了历史与未来发展的症结及其知识论的思想根源，莫兰多年来非常关怀教育的改革与方法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说，现代知识是一切社会危机的关键所在，那么，现代教育制度就是现代知识得以疯狂肆虐、而使危机恶性循环地和变本加厉地危害于全球的关键中介环节。

在这一点上，莫兰几乎与法国当代多位杰出的思想家一样，以深刻的洞见，谴责现代教育制度和机制，揭露它必须承担制造社会危机和导致自然破坏的主要责任。从2000年以来，莫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和同一辈的杰出思想家德里达、福柯、布尔迪厄等人一起，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与不同方法，批判现行教育制度，并提出改革教育的可行方案。在《接知识》、《未来教育的七种必要的知识》、《论一种文明的政治》、《与中学生关于知识的对话》、《为创建新的星球时代而教育：将复杂性思维当作人类的不确定和犯错误时代的教育方法》以及《上天的孩童们：在虚空、光与物质之间》等专论教育的著作中，莫兰反复强调：现行教育制度不仅传承、推广、普及和再生产一系列危害社会和自然的现代知识体系，而且制造、巩固和再生产社会的不合理制度及法制本身，促使已经累积的社会灾难和自然公害，积重难返和“雪上加霜”。

首先，莫兰揭示了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的现代知识的荒谬性。莫兰指出，所谓科学，在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于可能犯错误的风险的无止境的警惕或所谓“证实过程”而实现的一种朝向真理的“战斗运动”（*la science est un mouvement/combat vers la vérité qui s'effectue à travers la vigilance incessante sur le risque d'erreur ou vérification*）。实际上莫兰认为，我们并不能获得任何关于真理的绝对证据；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力揭示和设法论证错误。因此，所谓真理，无非就是相对于错误的真理。换句话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确认‘正确的’谎言。莫兰由此得出结论说：真理游戏的可疑性及其无可证实性是无法消除的（*inéliminable*），它永远只能以无止

尽的模式转换的方式继续欺骗我们自己。

莫兰还从历史根源上，探索现代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性，强调它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过程而推行的整体现代制度体系的巩固和不断再生产而稳定下来、并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同时，反过来，现代教育制度又是现代整体制度体系的生命线，因为现代教育制度，不仅保证了这种教育制度本身的延续性和再生产，加强其等级性、不平等性和加速分化机制，而且，也保证社会等级权力分配、社会区分及其再生产的有效性、延续性和不断更新机制。教育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相互寄生和相互催生，构成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主要生命线。这就是一切社会和自然危机之所以重复和变本加厉的真正原因。

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过程首先就是以教育的现代化作为其现行实施贯彻的中心机制。自从启蒙运动确立了以理性为主导的知识真理的追求目标，教育就成为了现代化运作的主轴。当康德界定“启蒙就是人从其自身造成的不成熟性中走脱出来”的时候，他就很明确地把理性的知识教育，当作现代人实现启蒙、完成自我确立、达到自我独立自主、并进行思想自由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因此要洞察现代教育的弊病及其症结，必须解构和重构历史，特别是像福柯那样，紧紧穿透作为现代性的“门槛”的启蒙运动(Les Lumières comme le seuil de la modernité)；正是在那里，集中地展现了现代性一切不合理性及其荒谬性的奥秘。莫兰在其著作中指出：教育机构给与学生的所谓知识和思维模式，是引导学生陷入真假游戏，训练他们在僵化的真假体系中盲目摹拟公式化、形式化、逻辑化、数学化、符号化和分类化的程序。莫兰说：“在古典的科学的思维模式中，从根本上排除了能够独立思索和反思的自我”。

他认为，在当代各级学校中，教育所推行的‘科学思维’和‘意识形态思维’两种模式，其共同点，就是千方百计地使独立思考的自我消失和迷惑在被谈论的“真理体系”中。在莫兰看来，教育中所说的理性和知识真理，只是僵化的摩尼教式“善恶二元对立”公式的具体表演和不断重演，旨在训练天真无辜的莘莘学子们，模仿和重演被统治者所确认的、作为标准的所谓真理的思维模式。在谈到这种单一性和单维的思维模式(*la pensée unidimensionnelle*)时，莫兰气愤地指出它们是“既残废、又残害人”(*pensée mutilée/mutilante*)。

因此，莫兰在严厉批判现行教育制度及其摧残人性的思考模式的同时，又积极地推广一种复杂性思维模式，主张走出人本逻辑中心主义(*Anthropologocentrisme*)、单维主义(*Unidimensionnisme*)、单向发展论、进步主义、主客真假善恶美丑二元对立论、技术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经济决定论以及规则秩序崇拜等传统思想的糟粕，尝试以非定则、无中心、非线性、非平衡

混沌、模糊、不确定、分叉、无限区分化的模式，面对自然界和社会，跳出犹太/基督教式的时间循环论和救世论的框架，把过去、现在、未来混合在无参照系统的游戏活动中，漫游在充满审美乐趣的创造活动中。

为了改造现有教育制度，在学校中必须鼓励和推行复杂思维，主张以复杂性的思维方式去思索多维的复杂性。复杂性思维既是原本的和自然的复杂性世界的一部分和构成部分，又是思考和理解客观的世界复杂性的可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复杂性思维就是贯彻于思维活动中的环保行动本身。莫兰早在他的《论方法，第二卷》中就提出和论证了作为教育改革核心内容的“行动的环保原则”(le principe d'écologie de l'action)。

什么是行动的环保原则？莫兰指出：一切行动，都以偶然性的方式，卷入到相互回归渗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游戏漩涡之中；而行动者主体本身却又往往对此状况无所意识。所以，尽管我们的思维模式长期以来已经被现代教育制度所熏陶和训练成违背自然混沌的真理模式，但我们仍然有希望借助于自然存在的行动环保原则，回溯到复杂的无秩序系统之中，避免一再地给我们制造灾难的现有的“科学思维模式”。莫兰还指出：一切自然和社会系统，包括我们的思想观念系统，都遵循着双重的基本行动原则：熵原则和环保原则(le principe d'entropie et le principe d'écologie)。正确的教育，必须训练学生熟悉和把握思想和行动的双重的熵原则和环保原则。必须使学生懂得：我们自己生活在复杂的混沌世界中，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复杂的混沌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是要尽力避免混沌和复杂，而是要设法介入和熟悉它们，甚至使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符合复杂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要掌握秩序、规律或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竭力发现偶然性、机遇性、变动性、多样性和多种可能性；不是追求可用于功利的真理体系，而是学会随时随地灵活机动地思想和行动。所谓思想和行动的熵和环保的双重原则，就是一方面意识到一切思想和行动，免不了要衰变、蜕化、腐败、减缓、消亡，另一方面又存在通过交往和沟通途径而实现的自我更新、重构、复兴、新生的多种可能性。因此，通过熵和环保的双重原则，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衰落和颓变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又同时有意识地训练自己重返生命的新陈代谢运动中，通过交往和沟通，吸取他人和外在环境的活力因素，继续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既不热衷于追求模式化的真理系统，又随时随地通过多重的偶然机遇游戏中掌握进行复杂性思维的本领。莫兰虽然严厉批评现有的教育制度及知识真理系统的危害性，但他始终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在现有的危机中找到了克服危机本身的机遇和可能性。

我们的未来仍然难于预料和不确定。根据莫兰的估计，人类社会的现阶段并未达到黄金时代，同样也不是黄金时代的黎明阶段，而仍然只处在“铁器时代”。所以，这根本不是启蒙的时代，而是处在“精神的史前期”。如果说，在20世纪，我们遭遇到危机与进步、倒退与革命相混合的时期，那末，在经历了各种动荡不定的局面之后，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冷静地思考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20世纪的经历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思考模式的无能、缺欠和残缺不全。因此，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思考我们自己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和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各种概念。

莫兰在他的分析中提出了令人深省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时间结构的碎裂；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分化及其各自独立性；倒退中的进步和进步中的倒退；迷失的未来；不知去向和无所适从等等。莫兰认为，尽管人类科学技术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但它远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人类在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成果，充其量也只能属于“文明的铁器时代”，距离人类文明的真正理念还是很远。所以，在许多法国哲学家看来，迄今为止所获得的科技成果，只能作为今后更长远和更宏伟的科学技术发展前景的一个起点罢了。

《道》的出版还突出了强烈的“风险政治”意识。也就是说，基于风险社会学的观察，莫兰认为生活在当代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必须树立和贯彻一种负责任的风险政治，因为当代科学技术已经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所以，一切人，不只是政治家，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公民，都必须有风险意识。复杂性思想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意味着一切都隐含或潜在风险。

风险政治并非消极地等待或静观风险，任凭风险发生或宰制，而是正视风险的多种可能性，确立可行的保险政策，在全社会实行全民保险。